

契丹寻踪

我的拓碑之路

刘凤翥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契丹寻踪

——我的拓碑之路

刘凤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丹寻踪：我的拓碑之路 / 刘凤翥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299 - 3

I. ①契... II. ①刘... III. ①契丹语—碑刻—研究
IV. ①H211.5②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700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契丹寻踪

——我的拓碑之路

刘凤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299 - 3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3/4 插页 8

定价：60.00 元

目 录

- 一、北大名师的言传身教 / 1
- 二、政治运动中忙里偷闲 / 13
- 三、运动中“地下”搞科学研究 / 30
- 四、第一次拓碑大收获 / 47
- 五、契丹小字研究的新进展 / 90
- 六、第二次拓碑大收获 / 99
- 七、零散的拓碑活动 / 126
- 八、第三次拓碑大收获 / 161
- 九、退休后第一阶段的拓碑活动 / 171
- 十、退休后第二阶段的拓碑活动 / 204
- 十一、退休后第三阶段的拓碑活动 / 263
- 十二、积累出来的赝品意识 / 290
- 结束语 / 314

- 附录一：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 / 316
- 附录二：刘邦振自传 / 370

一、北大名师的言传身教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所从事的职业既不能由个人来选择，更不能由个人来决定，往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在诸多因素中，名师的点拨和提携往往起着助推火箭的作用。

我之所以以解读契丹文字为终身职业，拓制辽金碑刻成癖，与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名师点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读书时的北大历史系正是名师齐集的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前的北大、燕京、清华、中法等大学的史学大师在院、系调整后均集聚在北大历史系。他们有翦伯赞、周一良、向达（字觉明）、邵循正（字心恒）、齐思和（字致中）、杨人楩（字萝蔓）、邓广铭（字恭三）、苏秉琦、张政烺（字苑峰）、商鸿逵（字子上）、张芝联、胡钟达等。

1. 听张政烺先生和邓广铭先生讲课所受的启发

一年级第一学期是在一面旁听“反右斗争”一面上课的，课堂秩序尚称“正常”。张政烺（字苑峰）教授给我们讲授先秦史，从



1982年春邓广铭先生（右）85岁寿辰时与作者（左）合影

中国猿人一直讲到秦的统一。张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也很少有幽默感，但他那渊博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和金文甲骨的深厚功底以及对先秦典籍的了如指掌都渗透在每一句朴实无华的言辞之中，使人听得津津有味。这使我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治历史必须广泛搜集史料，厚积才能薄发。

1958年的大学课堂秩序全被“双反”、“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给打乱了，直至1959年春才稍好一些。当时邓广铭教授给我们讲授辽宋金史。邓先生虽有讲义发给大家，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课讲得很活。当讲到学界有争论的问题时，他不仅讲自己的观点，也客观地介绍他所不同意的意见。例如，当讲到“纥军”问题时，“纥”字的正确写法究竟是“纥”还

是“紉”，该字究竟怎么读，它是什么意思，它原本是契丹字还是汉字等诸多问题，他都既谈出他自己的意见，又客观地介绍了国内外的其他众说纷纭的意见。世间还有契丹文字一事，我是在课堂上首次听邓先生说的。这对于我此后终身从事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不能不说是最早的启迪。

2. 向达先生谈拓碑

不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北大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早在全国性的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的七八年之前，我们班就曾于1960年下半年去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公社的黑山寨“上山下乡”整整一学期。及至发生了全国性的严重困难之后，这种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代替课堂学习的荒唐之举才有所收敛。一些被赶下讲台的名师又在陆续登台授业。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学兼中西的史学大师向达教授于1961年春开始给我们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13名同学讲授史料目录学的课程。向先生在讲课时曾提到，

鳳翥同志今夏卒業北雍將於秋後
入民族研究所專治遼金史離校前
持此書因為題數字通之一九
六二年九月十二日向達謹誌於海
濱之白園館書



向达教授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上的题字
(1962年9月)

碑刻是重要的史料，凡遇重要碑刻，应当手勤一些把它抄录下来，如能照相或拓制那就更好了，日积月累，最后必有大用。向先生还曾提到契丹文字是失传数百年之后于20世纪陆续出土的死文字，倘若解读了契丹文字，可为辽史的研究工作增加许多新资料，甚至改变辽史研究的面貌。

我对向先生的上述讲话印象特别深刻。有次我乘去燕南园向先生的家中请教其他问题之机又重提拓碑之事。

我说：“向先生，您叫我们遇见好碑尽可能地把它拓下来，这个意见很好，可我们都不会拓碑。请问先生拓碑的方法是怎样的？”

向先生说：“拓碑的方法很简单，用清水把碑洒湿。然后把宣纸铺在碑上，纸也就湿了。纸一湿就有延展性了。再用毡垫儿铺在纸上，用木锤子轻轻地敲打毡垫儿。如果没有锤子和毡垫儿，用湿毛巾叠一下，在纸上拍打，或在字口处使劲挤压，也能使有笔画地方的纸陷下去。然后等纸晾干了，再用块布包些棉花做成有弹性的布球，用布球蘸些墨往已经干了的纸上拍打，多拍几遍，等把墨色拍匀了，把纸往下一揭就行了。”

向先生传授的拓碑技术虽然过于简单，但他讲明了拓碑的基本程序。这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拓碑技术的启蒙教育。

3. 田余庆先生辅导我作毕业论文

我们二年级时分专业，我被分在历史专业。四年级时分专门化，我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专攻秦汉史。四年级下学期时张传玺先生辅导我作有关商鞅变法的学年论文。五年级时，田余庆先生辅导我作毕业论文。田先生命我先读《史记》、《汉书》以及有关

秦汉史的论著，让我根据阅读选定一个题目。第一学期末，我选了汉武帝方面的题目。田先生让我写一个写作提纲，我写了一个面面俱到的提纲送给田先生看。田先生看后把我叫去对我说，我写的提纲根本不行，不符合毕业论文的要求，面面俱到写一本书都容不下，要集中说一个问题就行了，要把问题说深说透。让我重新写提纲。我把写作内容限定在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方面，重新写了一个写作提纲送给田先生，他看后很满意，让我照提纲去写。我的论文草稿中转引了吴式芬、陈介祺合撰《封泥考略》中的一条资料，这条资料我是从别人的文章中转引来的。田先生看了之后，就把我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说：“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当时我以北大图书馆没有《封泥考略》这本书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田先生说：“严谨的学风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北大图书馆没有，可以去北京图书馆查。明天就去系里开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原书。”我照办了。翦伯赞先生也曾对我说过，他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了。这些教诲对我日后工作极有益处。

4. 翦老一席话，终生受用无穷

大学毕业之前，有关方面一再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中心意思是让大家做好改行的思想准备。内心深处，我认为上了五年大学之后用非所学实在可惜。为了摆脱改行的厄运，毕业之前我报



翦伯赞给作者写的条幅（1963年5月）

考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 1977 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述（字玉书）教授招收的东北古代民族史（实际是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去民族研究所报到之前，我向一些师长辞行。1962 年 9 月 13 日，我向商鸿逵教授辞行时，商先生再三告诫我今后要多学几种已经灭绝的古代民族的文字，如西夏字、契丹字等。同月 16 日晚上，我去燕东园 28 号翦伯赞副校长兼系主任家中辞行。翦老提到，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翦老命我去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民族古文字，

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等。翦老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了民族古文字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我对翦老一向很崇拜，他所说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即暗下决心：一定要永远铭记翦老的临别赠言，按翦老的嘱咐去做。这是我下决心研究契丹文字之始。

5. 求师不成决心自学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在中央民族学院（今已改称中央民族大学）院内。我于 1962 年 9 月 18 日去民族研究所报到。管人事的王秋同志顺利地给我办妥报到注册手续，安排好办公室和宿舍。办

公室在2号楼的258号房间，宿舍在6号楼的4169号房间。没过几天，另一名研究生史金波同志也来报到。他是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彝语专业毕业的，是王静如教授的研究生，专攻西夏文字。当时中国科学院还没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就安排在导师所工作的各个研究所内。除了主要任务是学习，不承担科研项目之外，与一般研究人员没有多大区别。我与史金波同志是民族研究所的首届研究生，也是我们各自导师的开山弟子。

翦老命我学习民族古文字的事我虽然一直牢记在心，但我对各种民族古文字的研究状况，谁是这方面的专家等情况一无所知。刚到民族研究所时，我曾盲目地向所内的两位老先生请教民族古文字，但都没有达到预期愿望。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要学习民族古文字只有勤奋自学一条路。我决心为了不辜负翦老对我的期望，沿着自学的道路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于是我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凡在报刊上遇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方面的文章，全都全文抄录。日积月累，数年之间，各积了满满的一纸袋子。正是这两袋子资料日后成了我进入民族古文字学术殿堂的敲门砖。

6. 契丹文字重见天日——凯尔温与瓦林茫哈

凯尔温是比利时国的一个人名，瓦林茫哈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地名。契丹文字把这个人名和地名联系在一起，使二者为学界所关注，并永垂青史。

辽朝（907—1125）是契丹民族建立的王朝。辽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意识的需要，曾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是辽太祖耶律

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创制。因为契丹大字过于模仿汉字，不适于契丹语单词多音节和用粘着词尾以表示语法关系的特点。更加适合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小字因此应运而生。契丹小字是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它与契丹大字相比是“数少而该贯”。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不是由于字写得大小，而是由于创制时间的先后，创制时间在先者为大字，创制时间在后者为小字。此外，它们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拼音程度强弱的本质性区别。

两种契丹文字和汉字一直通行于辽境。辽亡金兴，金朝前期，仍然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始“诏罢契丹字”（《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一》）。然而契丹文字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布而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会认、会写契丹文字的人还活着，他们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使用契丹文字。金朝没有统治到的西辽也还在使用契丹文字。西辽被蒙古人灭亡之后，契丹文字失去了最后一个推行它的政权。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期。蒙古人在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人几乎被征召殆尽。随着被迁徙到各地，契丹人好比被扔在大海里的一块冰，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他们都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没有了说契丹语的契丹人，记录契丹语的契丹文字也就随着契丹民族的消亡而消亡，逐步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文字既已死亡，用这种文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及文献也就失去了引起当时人们注意并加以保存的价值。当时的人们又没有收藏的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不断更替以及水火兵燹等变故，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各种书籍也就全部失传，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宋人王易《燕北录》一书中留下的牌子上，仅存已经面目全非的5

个契丹字。

契丹文的发现与研究始于凯尔温 (L. Kervyn, 1880—1939), 汉名梅岭蕊, 出生于比利时的胡格勒 (Hoogelde)。1902 年至 1905 年, 他在鲁汶大学学习神学。1905 年 7 月, 他正式成为神父。1919 年, 他被派到热河省林西县浩珀都小村子的天主堂 (即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的天主堂)。凯尔温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是首次发现了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契丹文字。

瓦林茫哈 (蒙古语音译, 意为“瓦砾滩”) 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的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山川秀丽, 辽代的三个皇陵就处在这里的深山丛林中。它们是辽圣宗的永庆陵 (俗称东陵)、辽兴宗的永兴陵 (俗称中陵) 和辽道宗的永福陵 (俗称西陵)。当地居民世代相传: 这几座庄严的陵墓里埋藏着大量无价之宝, 据说包括金桌子、银餐具、玉马、瓷瓶、皇家饰品、珍贵首饰以及无数的纯粹天然的稀有罕见的摆设之物。

1922 年春, 一些汉人在欲望的驱使下, 试图攫取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古物宝藏。他们掘开了辽兴宗的永兴陵。被挖开的永兴陵的八角形地下宫殿宽度大约有九米, 像一个大蓄水池。盗墓者采用了用柳条桶一桶一桶地往外舀水的办法, 人们轮换着用手来传递, 大约用了 30 个人工, 定时接替轮班, 一刻不停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日之后, 终于将水淘干了。再把乱七八糟的淤泥和碎砖头、腐烂的木头等残留物清理干净之后发现主墓室之外还有 4 个耳室。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发现皇陵以前曾经遭受过盗墓者劫掠。令人垂涎的金银财宝早已被洗劫一空。唯一的遗留物是一具被打开了的皇帝的棺材。已失去头颅的皇帝的骨骼散落在墓室的地面上。掘墓者们取走了大量的散布在地面上的木材, 这些木材, 原先可能铺



凯尔温（汉名梅岭蕊，1880—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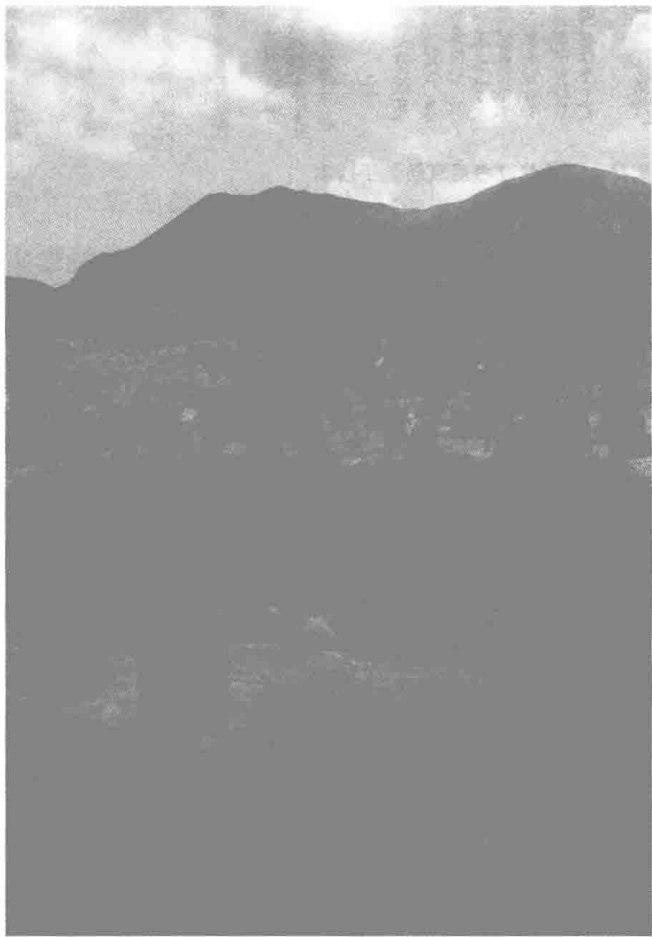
设在墙板上或覆盖在屋顶上。这些木材既珍贵又丰富，保存也很完好，可以将它们出售，尤其是作为棺材木料的柏木板，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

瓦林茫哈和凯尔温所在的浩珀都村教堂当时都归热河省林西县管辖，浩珀都村到瓦林茫哈有100多公里。那次盗墓拖延了两个多月，闹得林西县沸沸扬扬，因而此事也传到凯尔温的耳朵中。于是他

带着最强烈的兴趣前往现场住下来，每日去围观看热闹。他断定这样的大墓应当有墓志铭之类的文物出土，但他发现盗墓者并没有掘出这类文物。于是他就乘林西县令派兵把盗墓者抓走关押在县衙门之机，雇了三个当地的中国人进入墓穴中继续发掘，终于在1922年6月21日从淤泥中挖出四件灰色砂岩质正方形的哀册，两件契丹字的，两件汉字的。每一件都有700多公斤重，三个人无法把哀册举出六米深的墓外，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拓碑技术，只能忠实地进行逐字抄录。事情进行得既谨慎又相当迅速，因为担心陵墓被关闭。仅仅抄了两天，那些被抓走的盗墓者被释放了，他们又返回到陵墓。他们对凯尔温主持的抄碑行动声嘶力竭地抗议、谩骂。为了安全，凯尔温雇用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人一笔一画地抄写时，另两个人手持匕首站在一旁以防万一。他们花了五天的时间才完成了抄录四件哀册的任务。在原地用泥土把哀册掩埋。山水不断地往墓内渗入，没有多久就又成了蓄水池一般。

抄出来的四件哀册分别是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契丹字哀册上分别刻有 583 字和 856 字。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其学术意义堪与甲骨文的发现媲美。

凯尔温用法文写了一篇题为《辽道宗皇帝的陵墓——一个有趣的发现》的文章，并附上契丹字《仁懿皇后哀册》的手抄本照片发表在《北京天主教通讯》(*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923 年第 118 期上。详细报道了契丹文字哀册最初出土的情况。顺便指出，凯尔温误把当时掘开的辽兴宗陵墓当成了辽道宗陵。法国知名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又把凯尔温的这篇文章转载于当年出版的世界知名的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 第 22 卷上，并加了按语和注释。从而轰动了学术界。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学术界才了解到失



瓦林茫哈远景

炳滋主 般雙臂

署理

主理炳滋主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般雙主分般雙臂

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手抄本

传数百年之久的契丹文字已经重见天日。契丹文字学科的建立肇源于此。此后，人们一提起契丹文字就不会不想到凯尔温这个人性和瓦林茫哈这个地名。

二、政治运动中忙里偷闲

1. 晴隆“四清”初拓碑

我当研究生仅一年，各单位一批又一批地抽人去农村搞“四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也不例外。民族研究所由于受学部和国家民委的双层领导，研究所于1964年9月抽调一大批人员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去民族地区的“四清”工作，我也在内。平静的学习生活又给打乱了。

我们先在所内集中学习了一阵子，接着就于10月20日晚7点20分乘5次列车离京出发了。中途在贵阳和安顺各停留数日，最后于11月3日到达了贵州省的晴隆县开展“四清”工作。我先后在鸡场区的雨集公社的大新寨大队、旧寨大队和雨集队部工作。大新寨村的村民大部分是布依族人，主要是李、梁两大姓聚族而居。李姓村民说，他们与老伯寨村和流水寨村的李姓是同一始祖，始祖的墓在双江口，有墓碑云云。

双江口即大新寨村前的麻沙河与另一条河的汇合处。1964年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我与同在一村的“四清”工作队员王